

终极诊断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

郝在今 王 君 杨菊芳 编

● 难点卷

● 第四差别

● 官场岂能有黑市

● 不该殒落的“小太阳”

● 中国策划业的兴起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难点卷

终 极 诊 断

郝在今 王 君 杨菊芳 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诊断/郝在今等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1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难点卷)

ISBN 7-5035-1709-3

I. 终… II. 郝…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929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79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5.50 元

编 者 的 话

《90年代社会纪实丛书》已问世四年。其间，1993年底出版了第一批（六卷本），1995年初出版了第二批（二卷本），现在又推出了第三批——《终极诊断》、《死亡之悟》、《城市梳理》三卷本。

力求多视角地反映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是我们编选这套社会纪实丛书的宗旨。因此，我们特别注意选取题材重大、所反映的问题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作品，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作为一般读者，可由此纵览90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作为社会学、历史学工作者，可从中获取透视社会、分析社会的珍贵资料；作为领导者、决策者，则能以此为镜，审视社会……

9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各种事物变化纷呈。这一时期的社会纪实作品明显地带有问题性和批判性的特征。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的纪实作品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讴歌时代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也屡屡问世，震撼人心；而那些贴近生活、反映现代生活新动向、新内容的纪实作品则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套丛书里，尽可能地将社会纪实佳作一一奉献给读者。

借助于中央党校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我们翻阅了数十种报刊。入选的作品主要选自于：《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羊城晚报》、

《法制日报》、《科技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南方周末》、《新世纪》、《时代潮》、《三联生活周刊》、《华声》、《视点》、《共鸣》、《今日名流》、《青年一代》、《书摘》、《法律与生活》、《北京纪事》、《南风窗》、《三月风》、《解放军生活》、《金盾》、《风流一代》等，在此，特向入选作品的单位和作者致以谢意，并希望入选作品的单位或作者尽快与出版社联系，以便以适当方式答谢。

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社会纪实作品问世。也欢迎广大作者、读者继续向我们推荐纪实佳作。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官场岂能有黑市	卓 然 (1)
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	徐江善 (12)
泰山反贪风暴	安江 以德 传金 (21)
32 亿集资大骗局	邹 莫 (34)
明光窝案	张 坤 (61)
企业界对新闻界的银弹攻关	闻 心 (73)
中国策划业的兴起	王 标 (87)
群雄竞起保险业	熊 鹰 (100)
人才大战方兴未艾	黄文宁 (111)
第四差别	郝在今 (121)
公章危机	王灵书 (134)
高烧不退的医药费	高 昱 (161)
终极诊断	沈英甲 (169)
中国冷眼观“克隆”	曹海丽 (188)
沉重的担子——扶贫	王 安 (195)
救助贫困母亲	苏仁先 欧阳鸣 (203)
关注老人	艾 舒 (232)
临终谁来关怀	张建平 (239)
法律挑战婚外情	田 鹰 (247)
百姓能否吃上“放心肉”	阿 计 (264)
素质教育知难而进	钱立言 (277)
不该殒落的“小太阳”	李建平 (284)
回归儿童村纪事	冷 梦 (296)

中国第一偷	中府河 (309)
恶意透支信用卡	楠 楠 (322)
警惕黑客入侵	乔峰 孙健敏 (331)

官场岂能有黑市

卓 然

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给的，不是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卖的；如果胆敢将“官位”拿到“黑市”上去交易，必将受到严惩。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讲话指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的人还不少，买官卖官的也有，甚至还有骗官当的。”“用人方面存在的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外影响极坏，危害极大。必须严格整肃，坚决煞住这股歪风，坚决惩治这种腐败现象。”

人所共知，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给的，不是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卖的；如果胆敢将官位拿到“黑市”上去交易，必然会受到严惩。

贻害无穷的近亲繁殖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典型的封建专制“家天下”的产物，为历代仁人志士所不耻。古人讲“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与我们近亲男女不能结婚，都指明了血缘关系太近对后代成长不利的道理。在人事组合上，“近亲繁殖”也同样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已为历朝历代的兴亡盛衰所证实。

如今在选拔任用干部方面，在招工招干中，近亲繁殖现象几乎随时可见。

在工厂，“内招”“世袭”现象似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有的企事业甚至把招聘亲属、子女的内容写进条款，作为“内招”标准，强化了近亲繁殖的合法性。据对太原地区 10 家工厂的调查显示，这 10 家工厂近 3 年共招收 1345 名职工，其中 948 名是本单位的职工子女或亲属，内招率达 71%。

“为官一任，网络一帮”，是一些私心严重的领导在执政期共有的特征。河北省徐水县原粮食局长王成武，依仗职权安排其子女、亲属到本县粮食系统工作的达 29 人之多。其中担任基层职务的 6 人，从事会计工作的 8 人。

某国家机关的近 500 多名干部中，有 104 名互为亲属，其中属夫妻关系的有 64 人，父子关系的有 14 人，其他关系的 26 人，且半数以上是领导干部。

在工资待遇高、生活条件好的“热门行业”中，近亲繁殖现象更为突出。有关部门对某县 120 名科级以上干部的亲属工作做过调查，其中有 82 名干部的家属 118 人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工作，有 15 名干部的家属有 18 人在当地效益较好的企业工作，至少有 40 名家属的调配与权力有关。

在农村，近年也出现了村干部“父传子”的现象。湖南永兴县委组织部对全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作了调查，发现全县 25

个乡的 351 个行政村，其中竟有 98 个村存在“父传子”现象，占行政村总数的 27.9%。

近亲繁殖实际上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它以“私”字为核心，以“亲”字为半径，划了一个关系圈。圈内庸人简不了，圈外才人进不去。有了这个圈，法纪被弱化，言路被阻塞，公正难以体现，工作难以开展，其危害是非常大的。

“岭南虎”翼下的欧阳家族

欧阳德，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在东莞市当政多年，人称“岭南虎”。他就是一个滥用职权，大搞“帮派裙带风”的典型。

欧阳德共有三女二子，其中两男两女和大儿媳、二女婿、孙子、外孙子等 8 人先后移居香港。当然，这些由欧阳德依仗权势或弄虚作假混出境的子女，并不是要在香港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而是以假港商之名，转手来东莞捞私财。

欧阳德的大儿子欧阳忠本已爬上了东莞万江区区长的宝座，但仍嫌不足，决意去香港定居。两个月后，他便以“港商”的身份返回东莞做“生意”，与万江区政府“合作开发”滨江花园商住楼，未付分文本金，便由区政府担保获得 5000 万元贷款，尔后将全部股权转至个人手中。就这样，不到两个月时间，这位大公子便成了拥有数千万资产的“富商”。

另一个公子欧阳勇去港定居后也杀回东莞经商。他在一无人员二无技术三无设备的情况下，依仗其老子在东莞“大哥大”的权势，借用一个工程队的牌子，硬是把本已确定由别家承包的凤岗海关 2000 万元的推土工程强夺到手。转手之间，700 多万元人民币便轻轻松松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二女婿陈柱豪原系政府车队的司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却被提拔为公安局车管科副科长，独揽了汽车牌照的发放大权。他

帮助香港某公司下属的国内企业办理小汽车入户发牌手续时，为其中5辆留下末尾号码为“8”字的“吉祥”号码车牌，收受港币27.5万元，存入私人账号。之后炒卖地皮非法收入150万元，结果被判处11年徒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欧阳德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的弟弟是某镇的党委书记；他的妹夫本是个农民，后来摇身一变为市外贸局的一个科长；他的女婿是市卫生局局长；连他的司机也登上了某镇党委书记的宝座。

这些人的权是欧阳德给的，他们会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办事吗？显然不会！他们只能为欧阳家族的私利卖命。如今，这只“岭南虎”被判处15年徒刑，成了笼中嗷嗷哀鸣的困兽，欧阳家族也轰然倒塌，一败涂地。

日照“第一夫人”的悲剧

1996年11月23日，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因受贿罪、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消息传来，不少人为之扼腕痛惜：一个曾经与人民同甘共苦，被誉为“开拓型的领导干部”的好书记，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坦然受贿、包庇犯罪分子的罪人了呢？知情人道出了这其中的真谛：晚年，王树文在用人上犯了错误，尤其是他的再婚妻子徐峰丽起了关键性的坏作用。

徐峰丽比王树文小14岁，是一个骄横任性、好出风头的女人。她原是邮电局下属企业一名职工，婚后随王树文来到日照市。不久她便当上了市邮电局宣传科长。一年后，王树文让她一职高挂，到市体委挂任副主任。

1993年秋，王又提出让徐到高科技园任筹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都知道徐的为人，纷纷反对，王树文不顾起码的组织原则，擅自带着徐到高科技园宣布了任免决定。

徐峰丽背靠大树，狐假虎威，自恃为日照“第一夫人”，插手政务，干涉干部人事工作，甚至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干部的任免。而王树文却对她宠爱有加，娇纵放任，言听计从。

人们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背地里骂她为日照的“小江青”。王树文耳有所闻，多次在会上讲：“与徐峰丽闹摩擦，就是对我有看法，不支持我的工作，不支持市委的工作。”

1994年1月，徐峰丽伙同他人走私日产旧摩托车350辆，价值230多万元。案发后，王树文不但不悔，反而为徐开脱罪责，订立攻守同盟，对抗侦查，以至被这个女人完全拉下了水，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王树文蜕化变质过程中，还有一帮围在他身边的势利小人吹风点火，也使他在昏昏然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原日照市公安局局长朱士杰是一个素质极差，群众威信极低的谄谀之辈。这样一个人能当上公安局长完全得益于他的拍马术：徐峰丽出行，他警车开道；徐峰丽洗海水澡，他在一旁当警卫；徐的孩子郊游，他派公安人员全程护送。他每见到王徐二人，必整衣敬礼，口里连呼：“敬爱的王书记，敬爱的徐主任！”奇怪的是，一个共产党的书记，面对如此肉麻表演，竟然心安理得，毫无反感。这哪里还有一点“公仆”的味道？

如今，王树文、徐峰丽、朱士杰均被判处徒刑。一桩轰动全国的“1.26”走私案划上了句号，而日照“第一夫人”的悲剧是否还正在一些地区上演或重演呢？

买官卖官案件大通报

任人唯亲，近亲繁殖是一种腐败，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是一种更严重的腐败。跑官者，自吹自擂，四处游说，厚颜无耻，近乎无赖；要官者，察言观色，口若悬河，死皮赖脸，形同乞丐；买官者，为了官帽，宁折钱财，先予后夺，奸若市侩；卖官者，贪

冤枉法，唯钱是举，失身丧节，恰似官妓。

目前，卖官买官现象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97年3月17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出《关于郑元盛、郑泽生卖官案件的通报》，为买官卖官者敲起警钟。

江西省广丰县是江西东北部一个有名的贫困县。1991年，郑元盛调到广丰任县委书记，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卖官鬻爵。下属见此，多有仿效，送钱买官者涉及本县45人，大多数为科级干部。

广丰县羽绒厂原厂长毛先锋贿赂人民币4.4万元和金项链一条，郑元盛便将毛转为干部，提为正科级。

广丰县物资局金属公司原经理郑黎明为得到商业局长的位置，先后向郑元盛行贿人民币3.4万元、美金500元。后因郑黎明本人素质太差，县长又坚决反对，才未兑现。郑元盛只好将其调到县外贸总公司任副经理，提为正科级。

十都乡乡长吴杰光送郑3.5万元，便很快达到了乡长、书记一肩挑的目的。

“要当官到广丰，去找郑元盛”，这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表达了人民对卖官现象的痛恨，然而，郑元盛直到被查处仍然不醒悟，他说：我这不算什么，卖官在江西还有的是，有比我还严重的。此语虽是狡辩，确也从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买官卖官现象的严重危害性。

山西省汾西县孟永明，在担任县交通局副局长、乡镇企业局局长期间，曾因公款吃喝、偷税贪污等问题被立案查处，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谁能想象，在他连续向汾西县委书记郑泽生等6名县级领导行贿近10万元后，却险些爬上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宝座。只是由于地区检察院的反对才未能得逞。郑泽生受人好处，无以回报，便又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改任孟为县计划委员会主任。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性质十分恶劣的受贿卖官丑行中，竟

还有汾西县长、两个副县长、两个县委副书记。伸手必被捉，贪利必有患，他们都分别受到了相应的制裁。

“送”出来的政治暴发户

1995年9月底，陈希同被撤销职务。不久，北京市延庆县县委书记刘金生因严重违法违纪、大肆贪污受贿、挪用挥霍公款，受到查处，近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检察机关已依法对他提起公诉。

刘金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陈希同是什么关系？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一场卖官、买官的丑剧大白于天下。原来，刘金生是个靠“送”攀上“高枝”的政治暴发户。

刘金生政治素质极差，文化水平也不高，却善于政治钻营。1989年，担任顺义镇党委书记的刘金生结识了陈希同的儿子，庆幸抓到了一棵通往“天堂”的稻草。于是，他拼命献媚上贡：陈公子数次出国，他全部包揽了费用；陈公子在电话里说一句“刘哥，我去看你不方便呀”，刘便心领神会，很快送去一辆轿车。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10月，他请客和以实物送礼的金额就达85万元。

到延庆后，刘金生仍不忘这条升官之道。逢年过节，他必到陈希同、王宝森等人家中去送礼。他先后送出了8辆轿车，除一辆“奔驰”由陈希同使用外，其余7辆都是送给私人子女使用的。

正因为有这些硬通货铺路，便出现了县委领导不能正常调动一个镇委领导的奇迹：1993年8月，顺义县委决定调刘金生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得到消息后，觉得委屈了自己，便直奔京城，找到陈希同的儿子，并在电话中向陈希同诉“苦”。两个月后，市委正式任命：刘金生为延庆县县委书记！

刘金生花了钱，买了官，上任后便疯狂地往回捞。在很短的时间内，他采取重复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1万多元，收受贿赂4.8万元，挪用公款41.3万元。

刘金生的嘴脸渐渐暴露了出来，名声不佳。当1994年2月换届选举时，他面临被淘汰的尴尬。为稳住刘金生的位置，陈希同派人到延庆坐镇，做大家的工作，让大家一定要把刘金生选上。这种强奸民意的作法，引起了干部群众的极大反感。

建立在金钱和欺骗基础上的政治暴发户是不会“长发”的，从刘金生的升迁与跌落的轨迹中又一次得到证明。

混混儿跑官三战三捷

广东省徐闻县有个无业游民叫杨华昌。此人，1987年盗窃碎石机被查处，1988年诈骗44万元贷款被收容，1992年好不容易找个临时工又因撒野闹事被辞退。就是这样一个集盗窃、诈骗、赌博等恶迹于一身的“混混儿”，却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成了聘用干部，吃上了皇粮，当上了“保卫官”。这其中的奥秘何在？答案是：跑官与卖官！

1993年，湛江市决定在乡镇企业中吸收一批聘用干部。杨华昌明知自己不够条件，却知道“金钱万能”的“信条”，决心试一试。在“朋友”的引荐下，2月的一个晚上，杨带着“供品”来到县委书记苏凤娟家“烧香”。果然灵验，苏“指导”他回城南乡找组织委员李温武。于是，杨多次跑李家，再加之两家是亲戚，聘干之事李一手包下。之后便是炮制公文，花4000元买大专文凭，伪造考察材料，花2000元代县人事局请客等等。4月16日，杨华昌如愿以偿，被县人事局批准为“城南乡复合肥厂聘用干部”。

杨华昌很清楚，聘干只是个虚名，离实惠相距甚远。于是，他想先调往前山镇“镀金”，然后再杀回机关当官。于是，第二轮跑官活动又开始了。他先拜访前山镇杨书记，又提着“袋子”到县人事局两个局长家，最后又去摇苏凤娟这棵大树。一路杀来，一路绿灯，1993年11月，杨华昌调往前山镇，穿上了“官袍”。然而，杨华昌穿什么“官袍”也是那个恶习不改的杨华昌。不到半

年，他连续吵架、闹事、赌博，被批评、被罚款，只好停薪留职，又成了浪迹县城的“混混儿”。

杨华昌也毕竟是那个足具“跑官”才能的杨华昌，他被公安处治后，发誓要当公安，自己掌枪掌权。于是，第三轮“跑官”活动又开始了。他走访公安“老友”，回访前山镇书记、镇长，到二轻局找官位，“拜访”县局领导……经过一系列昼夜不停的“跑”，终于又东山再起，攻破第三关，当上了一个“保卫官”。

正在杨华昌志得意满之际，东窗事发，其弄虚作假搞聘干、调动，提拔的问题全部露了馅儿、曝了光。几个为虎作伥的县委书记、人事局领导、镇长、副镇长、组织委员，分别受到了严肃处理，而杨华昌仍然去当他的“混混儿”。

弄虚作假，蒙官骗官

骗官，即靠弄虚作假的手段去捞官。骗官形式多样，或夸大政绩，虚报产值，请功邀赏；或高喊口号，摆花架子，沽名钓誉；或买通关节，伪造资历，滥竽充数；或溜须拍马，投其所好，骗得信誉。如此种种，都离不开一个“骗”字。

某区开展三年农村人均多种经营纯收入达千元活动。这个区的某乡第一年就爆出了许多冷门：鸡由2000只一下子发展到5万只，山羊由10户一头增加到一户一头，甲鱼放养面积由30亩扩展到了1500亩。据知情人讲，这些数字至少有五成水分。于是乎，该乡的事迹马上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成了先进典型，乡长大人也因此迅即升为区长大人。在欢送乡长赴区上任的那天，不知谁在乡长乘坐的小车玻璃上写了一行字：“热烈祝贺‘水’区长上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一道理。

与虚报同时存在的是作假，这也是“骗官”的一种表现形式。诸如为了调入、提干、升迁等而搞假学历、假工龄、假介绍信等等。

河南商丘地区对 333 份招聘干部档案进行鉴定，发现竟有 226 人的大专毕业证是假的。

某县林业局长为了让已被勒令退学又蹲了 15 天拘留所的小公子能到本县税务部门工作，调动所有关系，没几天，团员证、毕业证、三好学生证、优秀职工证等一应俱全，“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一名堂堂的税官。

1996 年，河南省驻马店市对全市 540 名科技干部的档案进行审查发现，共有 82 人次谎报年龄，62 人次谎报工龄，还有 54 人次的学历文凭不真实。此外，26 名科级干部的入党手续及材料不全。这种“年龄越报越小，工龄越报越早，学历越报越高”的不正常现象，已给干部的任免使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吹牛大王胡建学

“泰安大案”已成过去，然而这其中的教训却是余音缭绕，回味无穷。尤其是“山大王”胡建学，集骗官、卖官于一身，颇具典型。

1984 年，胡建学才是山东省计委的一个副处长，6 年之后，他便当上了泰安市长；1991 年，他又爬上了市委书记的宝座，当时，他才 41 岁。

胡建学是靠什么飞黄腾达、掌印执政的呢？这其中一大部分是靠弄虚作假，自我吹嘘！

他首先是吹自己。胡建学当过兵，在他 19 岁的时候曾到一家煤矿住过几天。凭这点经历，他吹嘘自己，1969 年就在内蒙古管理过一家上万人的大煤矿，以显示自己有经验、懂管理。

胡建学宣传自己绝对慷慨，每年拨给市委宣传部的“公关”经费就达上百万元。就在他被捕的前 3 个月，一篇歌颂胡氏政绩的长篇报告文学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一家有名的期刊上。

其次是吹政绩。胡建学深知数字与官位的关系，明令统计局